

中華學術叢書

朱希祖文存

朱希祖 著
周文玖 選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朱希祖文集

朱希祖文集

中華學術叢書

朱希祖文存

朱希祖 著
周文玖 選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朱希祖文存 / 朱希祖著, 周文玖選編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6. 12

(中華學術叢書)

ISBN 7-5325-4448-6

I. 朱... II. ①朱... ②周... III. 朱希祖 (1879 ~ 1944)—選集 IV. C5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6) 第 054437 號

中華學術叢書

朱希祖文存

朱希祖 著

周文玖 選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新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14.75 插頁 5 字數 370,000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300

ISBN 7-5325-4448-6

K·874 定價: 39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 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出版說明

自 1991 年王永興先生的《唐勾檢制研究》、柳存仁先生的《和風堂文集》與項楚先生的《敦煌文學叢考》出版以來，《中華學術叢書》至今已走過了十五個年頭，已刊與將出的名家研究著作，也已接近二十種，並在海內外學界贏得了高度的贊譽。當前民族文化的復興已成為國家的文化戰略，而學術昌隆，正本清源，更是文化復興的前提，為此，本社決心花大力氣，通過相應的調正，來加強本叢書的出版力度。

《中華學術叢書》定位為海內外漢學界高端論著交流的平臺，以及時薈萃一流漢學研究著作為己任。她與集成性整理性質的《中華要籍集釋叢書》並列，將成為本社古籍整理與古籍研究的兩個核心品牌。

《中華學術叢書》將不限於原初以傳統漢學研究為主的格局；凡學殖豐厚，思理深刻，卓有創見的漢學研究，無論其方法是傳統的還是新潮的，其視角是單一學科的還是跨學科的，都將進入編者的視野。

《中華學術叢書》的作者，將由原來以大陸老一輩專家為主，而擴展為朝向一切術業有專攻的學者，她既為名家大師一生著作的集粹，也可以成為中青年俊彥頭角初露的溫床；她對於大陸、港澳臺乃至各國漢學家的優秀著作一視同仁，因此部分漢譯著作，也將

適當採納。

《中華學術叢書》的形式，以專著、專史、專題論集為主，也適當地採用“文存”的形態，如果有既合乎基本學術規範，而形式更有創新的著作，也不妨嘗試。

我們感謝已進入本叢書的各位專家的奉獻，感謝本叢書各個方面的熱誠讀者；我們更衷心地期盼與更廣大的作者群通力合作，共同打造好《中華學術叢書》這一知名品牌——爲了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二〇〇六年十一月

前 言

朱希祖，字逖先，1879年出生於浙江省海鹽縣長木橋上水村。朱家係浙西望族，自明以迄清季，共出了13名進士，其中，翰林一人，狀元一人，可謂詩禮家傳，源遠流長。但至希祖祖父一代，已家道式微。祖父、父親都只是庠生，在家鄉以教書爲生。然他們篤學力行，亦爲鄉人敬重。希祖兄弟六人，他行次第二，長兄、三弟、季弟早夭，故於諸弟中實居長。他幼承庭訓，聰慧穎異，爲家族所厚望。叔祖父曾以“努力讀書正少年，願伊早着祖生鞭”的詩句予以勉勵，父親因以賜名希祖，字逖先。不幸的是，在希祖十四歲時，父親突然得病去世，希祖不得已就館他鄉。1896年中秀才，1901年舉稟生。爲撫養諸弟，他從當地風俗，早早地結了婚，並到富人大戶家課徒授業。1905年，希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浙江省官費留學生，並於同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師範科攻讀歷史，1909年夏卒業。這期間，章太炎東走日本，幫助孫中山主編《民報》，宣傳

革命思想，並開設國學講習會。希祖與錢玄同、周樹人、周作人、許壽裳、錢家治、朱宗萊、龔未生等人共同受業於章氏，常至民報社及大成學校，聽章太炎講《說文》、音韻和史學，並時常請益。在章門的著名弟子中，他專攻史學。章太炎《自定年譜》“宣統二年”條云：“弟子成就者，蘄黃侃季剛，歸安錢夏季中，海鹽朱希祖遜先。季剛、季中，皆明小學，季剛尤善音韻文辭；遜先博覽，能知條理。其他修士甚衆，不備書也。”

1909年自日本歸國後，朱希祖就職於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。當時在這個學校當教員的多是留日學生，如馬裕藻、周樹人等。1910年春因師範學堂發生風潮，而改任嘉興第二中學教員，沈雁冰（茅盾）即是他這一時期的學生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，各省響應。朱希祖携眷歸里，被推戴為海鹽縣民政長，後改民事長、知事。因為從政非其素願，故半年後辭職，而至沈鈞儒任司長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職。去職之時，鄉人扶老携幼，遮道請留。1913年正月，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國語讀音統一會，聘專家若干人，各省派代表二人，蒙、藏代表各一人，華僑代表一人，出席會議。這次會議對代表資格要求甚嚴：一須精通小學，二須旁通一種或兩種以上外語，三須諳曉多種方言。朱希祖與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會議。會議期間，與會代表提出的議案衆多，分歧很大，爭論也很激烈。最後通過了朱希祖聯合馬裕藻、陳睿、許壽裳、周樹人、錢稻孫等人提出的議案，即擇古文篆籀徑省之形為字母，既採其形，又符合其本音。凡聲母二十四，韻母十二，介母三，稱注音字母。國語有注音符號，始於此時，朱希祖與有功焉。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師學界，北京大學預科學長胡仁源決定聘他為預科教授。1914年，清史館又聘他為協修。時袁世凱密謀帝制，清史館總纂趙爾巽贊成輔翼之，朱希祖羞與為伍，憤而辭去史館職務。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為袁氏軟禁。章氏以絕食相抗。朱希祖與其他章門弟子奔

走營護，勸慰至備。一日，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，說：余爲國絕粒，雖以身殉，亦無遺憾。余歿後，經史小學，傳者有人，光昌之期，庶幾可待；文章各有造詣，無待傳薪，示之格律，免入歧途可矣。惟諸子哲理，恐將成廣陵散耳。這一時期，朱希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，據說他常向章太炎請教中國文學史，以分散章氏憤懣之情緒。他編輯的《中國文學史講義》，流傳較廣，頗得好評。

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，廣延學者，兼容並包，並倡導新文化。朱希祖當時作爲國文研究所主任，積極響應，與文科學長陳獨秀、新聘教授胡適之等，相與上下議論，提倡白話文學，以及民治與科學等思想，並在《新青年》等刊物上發表了一些倡導和支持新文化運動的文章，如《白話文的價值》等。在北京大學這個新舊思想匯聚之地，他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。當時以保守著名的《國故月刊》同仁希望他加入他們的編輯部，被他婉言謝絕。^①1919年，他與馬裕藻、錢玄同、周作人、劉復、胡適等向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提出議案三件，即《請從速加添閩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議案》、《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的議案》、《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的議案》，極大地促進了國語統一和白話文的推廣。1920年底，他與鄭振鐸、葉聖陶、沈雁冰等十二人，發起成立了文學研究會。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著名的新文學團體。

1920年夏，北大史學系系主任康寶忠去世。經蔡元培校長推薦，朱希祖繼任史學系系主任。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滿奉系軍閥改組北京大學而暫就清華大學等校教授外，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幹到1931年初。在教學體系上，他以歐美新史學思想爲指導，規劃史學系課程；在課程設置上，他重視史學理論課的建設；在教學方式上，他主張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自主研究能力；在師資方面，他廣攬人才，耆儒新進，皆所延聘。經過這個階段，北京大學史學系成爲具有現代學術體系的歷史學系，對國內其

他高校史學系的建設也產生重大影響，極大地促進了歷史學的獨立以及中國史學由傳統向近代的轉變。在北京期間，他還在北京師範大學、輔仁大學、女子師範大學等校兼有教授之職，主講中國文學史、中國史學概論等課程。1928年10月，他兼任天津《益世報·學術周刊》的主編。這年年底，他發起籌備中國史學會。1929年1月13日，中國史學會開成立會，到會者有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、燕京大學、輔仁大學、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六校教師和學生共94人。這是中國最早由多個高校歷史學系的師生自發組織的歷史學會。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為中國史學會主席。在此之前，他還被舉為故宮博物院審查《清史稿》主任，負責對《清史稿》的審查。

1932年10月，朱希祖應中山大學校長鄒魯之聘，南下廣州，任國立中山大學史學系教授、文史學研究所主任，並兼任廣東通志館纂修。廣州是南明諸王興兵抗清之地，朱希祖蒐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，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學工作之便，進一步訪求史料，實地考察南明史跡。他與中山大學史學系的教師一起發現了南明紹武君臣羣冢，並作《恭謁南明紹武君臣冢記》。他訪問了廣州當地的藏書家，見到不少珍貴版本書。在廣東通志館，他撰寫了《廣東通志略例》、《廣東通志總目》、《廣東通志說明書》等。對新編《廣東通志》，他實際起了發凡起例的作用。他還為這部新型的通志撰寫了《明廣東東林黨列傳》。在這一時期，他對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，撰寫了《翁山年譜》、《屈大均傳考證》、《翁山詩外版本考》等。他為史學系的學生，開設了四門課程：中國史學概論、元明史、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。有一位當年的中山大學學生說，他開設“史通研究”，“對於劉知幾的史學理論和所舉的史實，每每有所駁正，引證贍博，聽之入神”。^②當時史學系主任為朱謙之，以介紹西洋史學理論為同學歡迎，史學系同學稱他們為“二朱”。在文史學研究所，

他招收了研究生，此舉蓋為中山大學研究生培養之始。

1934年1月，南京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致函朱希祖，欲聘他為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。朱希祖早就打算北歸，又因南京距故鄉海鹽不遠，親戚故舊頗多，且其長子朱僕也在中央大學任經濟系教授、系主任，於是決定北上。3月到任。朱氏離開中山大學令校方頗感突然，校長鄒魯、文學院院長吳康、史學系主任朱謙之均先後致書於他，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學。但朱希祖最終沒有回去，而是在中央大學開始了他教學生涯的最後一個階段。

中央大學在20世紀30年代頗有趕超北京大學之勢。一是南京係當時全國的政治中心，國民政府加強了對中央大學的投資建設；二是南京也是東南文化薈萃之地，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、歷史悠久的高等學校；三是從北京大學等校因派系之爭受到排擠的不少一流學者，紛紛到中央大學就職。此時的中央大學文學院，章門弟子的地位舉足輕重。黃侃、汪東、朱希祖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，都任教於此。汪東還是文學院的院長。朱希祖任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，所定課程體系，自然還是以他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當主任時制定的課程標準為基礎，並略為變通。除了中央大學的教職，朱希祖還有不少社會兼職。如1934年6月以後，被行政院聘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；1935年10月，被考選委員會聘為高等考試典試委員。1936年2月，受章太炎之約，到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學，每月去蘇州講學一次，直到抗日戰爭爆發。他還利用課餘時間，與長子朱僕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邊城市考察六朝陵墓，辨認文字，從事攝影、測量、考證工作，最終完成《六朝陵墓調查報告》一書。

1937年7月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，9月，中央大學開全體教授會議，決定將校址遷到重慶。朱希祖一方面忙於史學系師生搬遷的安排，另一方面設法安置自己多年經營的藏書。經過極其

艱難的不斷轉運，終於把書籍遷藏於安徽隆阜戴東原後人戴伯瑚家。10月下旬，將藏書安置停當後，纔起程入蜀，於11月初到達重慶。初到新校，骨肉離散，親朋寥落，希祖感懷國難，時常憂心忡忡，儘管如此，他仍然奔波於住處和校園之間，教學、行政未稍懈怠。中央大學史學系學生組織史學會，推他為會長。當時教育部擬頒大學課程標準，徵求意見，作為資深教授，朱希祖鄭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議，對歷史學科的規劃和建設產生深遠影響。1939年，他代張繼起草了“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案”，並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通過，議決交國民政府實施。1940年，國民政府成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，聘朱希祖為秘書長，後改總幹事，實際負責籌備工作。他賃會址，延專才，商榷史例，探討史館組織條例和選取史學人才條例，部署會務。百端草創，出力甚多。有一首詩云“廢絕黎洲徵季野，忽開史館雜旌旄。十年建國無文字，今日行都見鳳毛”。^③就是推重他這一時期在史館的作用的。1940年3月，朱希祖又被國民政府簡任考試院考選委員。他既籌謀修史，又忙於考選事務，往返跋涉，精力交瘁。於是他辭去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及教授職務。國史館籌備委員會雖規劃多經草擬，而未能即為實施，因以辭去總幹事職，改做顧問，而專任考選委員，並悉力著述。1943年3月，中國史學會在重慶成立，朱希祖被選為史學會理事及常務委員。

朱希祖在重慶時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、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。他一生花費精力最多的南明史，本應在這一時期進入撰寫階段，因為資料遷藏於異地，而不能着手進行。春秋戰國至秦史事，大都在羣經諸子中，自隨書籍基本能夠滿足研究之需要，所以他把精力轉向了先秦，特別是戰國史。他說他之所以研治戰國史，一因今日世界為一新戰國，頗可鑒古以知今；二因中國學術思想亦以此為最發達，整理戰國史，其價值等於歐洲史之希臘史，秦史則等於

羅馬史，此二史若成，則在中國史界可推為最大之偉業。這期間他著有《汲冢書考》五卷、《戰國史年表》八卷，兩書在發現史實方面，均有重要的學術貢獻。

日本飛機對重慶實施了野蠻的轟炸，年邁的朱希祖也經常為避空襲而喘息不安，加上重慶多霧，冬多陰雨，夏多蚊蚋，飲水不潔，時常生病。進入 1944 年，朱希祖的身體狀況時好時壞，幾度住院。7 月 5 日，朱希祖病逝於上海醫學院附屬醫院，享年六十有六。國民政府發佈了褒揚令，為他舉行了公祭。各界贈送挽聯三百餘幅，學界名流及官員出席者三百餘人，這在戰時的重慶，可謂是極一時之哀榮。

二

朱希祖是一個學者，國民政府給予他高規格的禮遇，主要是他在學界的地位決定的。他有一首詩《自嘲》：“不與人物接，不與山海游。終生伏几案，天地一書囚。”這首詩實際上是他對自己的人生畫像。可見，學術研究纔是他孜孜以求的事業。

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後，《文史雜誌》推出了紀念他的專號。朱氏的女婿、歷史學家羅香林發表了《朱遜先先生著作目錄》(包括未刊稿)。現在看來，這個目錄儘管尚有不少遺漏，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學術規模。這個目錄將朱氏著述分為十六類：一、屬於史學理論者二種；二、屬於史跡發現者二種；三、屬於史料輯錄者三種；四、屬於史學考證者五種；五、屬於版本目錄者五種；六、屬於戰國史者二種；七、屬於蕭梁史者三種；八、屬於唐史者二種；九、屬於宋史者三種；十、屬於明史者四種；十一、屬於近百年史者二種；十二、屬於家史者二種；十三、屬於文學史者二

種；十四、屬於小學與經解者二種；十五、屬於日記隨筆者一種；十六、屬於詩文集者二種。^④這十六類中的每一種，有的是專書，有的是文集。從這個目錄可以看出，朱希祖的著述極其豐富。

從研究的斷限看，朱希祖研究的時間跨度很大，上自先秦，下至近世史，各個斷代都有研究成果。如先秦時期有《東西周君年表》、《西周君世系考》、《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數考》等系列考證文章，近世史中有《太平天國史事論叢》、《黃花崗烈士傳》等。其他像漢、三國、魏晉南北朝、隋唐、宋遼金西夏元、明、清等均有許多考辨文章。特別是對戰國史、南朝蕭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，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，所取得的成果比較多，他在這些領域造詣很深，在當時被譽為權威。唐史雖不是他的專長，但從他與陳寅恪的商榷文章《駁李唐為胡姓說》來看，他對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。

從內容說，他的研究領域十分寬廣，有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的研究，如《中國史學通論》、《史館論議》、《太史公解》等；有經濟史的研究，如《梁代貨幣考》、《兩宋盛行鐵錢之因果》、《明代金花銀考》、《桑弘羊之經濟政策》等，《桑》文發表於 20 世紀 20 年代，實開近代研究經濟思想之先河；有宗教史的研究，如《梁代佛教考》；有中國文學史的研究，如《中國文學史略》；有氏族學、民族史的研究，如《左傳姓氏錄》、《兩漢姓氏學》、《雲南濮族考》等；有目錄學的研究，如《宋代官私書目考》、《宋代金石書目考》、《版本目錄學論叢》等；有金石學的研究，如《六朝陵墓調查報告書》、《安洲古器圖考》等；有歷史地理學的研究，如《戰國地理雜考》、《雪山党項地理考》、《黑党項所居赤水為洮水考》等；有文字學的研究，如《中國文字學》等。此外，他在史籍考訂、史籍輯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在輯佚方面，有《楊么事跡考證》、《偽齊錄校證》、《偽楚錄輯補》等專書。

在方志學方面，他用力甚多。1924 年，他就開始蒐集方志。他重視利用方志治史，許多史學著作採用了方志資料。1929 年，

他曾為弟子傅振倫主編的《民國新河縣志》作序，盛贊該志為新型方志之準繩，且極力倡導編修新志。他主持修纂的《廣東通志》，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學思想和修志實踐。首先，該通志以阮元撰《道光廣東通志》為基礎，並總結其利弊得失，提出了符合時代變化的通志體例，使這次撰修的通志體例、篇目具有了現代志書的性質。其次，主張《廣東通志總目》分為紀、表、略、傳四體，對舊體例有沿有革。他認為修志宜統合古今，其理由：一是“通志之名，嬾於通史，肇自遠古，迄於當今，是名曰通”。因此，只有將古今重大事跡網羅為一書，才能觀其會通。二是近代新事物層出不窮，雖盛極於當代，然“亦胚胎於清季，斯皆斷代之所不便述”，指出修志體例既應“儲積廣博，鑒別精確”，又需“觀察通貫，始終條理”，而且必須考慮時代變化，志書內容篇目“勢須增減”。此外，他還對如何記人物、如何記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，說“同在省區，有本省人焉，有外省、外國人焉，故可分內傳、外傳。本省人人內傳，外省、外國人人外傳。內傳又分為專傳、匯傳，專傳注重個人特性，以人名分代編次，匯傳注重社會羣體，以事類分派編次”。他還改阮元《廣東通志》“事前略”為“大事記”，因為“事無鉅細，皆為前事，大事則隨時隨地，皆可自立標準，以定取捨”。^⑤這樣的論述，確為卓見。他認為纂修志乘，並非易事，“作縣志之法，能兼得今世歷史、地理二學之所長，乃得為善志，蓋綦難矣。惟其為歷史學科也，故必博訪遺事，廣儲史才……惟其為地理學科也，故必實測幅員之修廣、山川之崇深……他若政治、經濟、風俗、文化之實況，皆應考察精密，統計真確”。^⑥說如無歷史地理“二者之備”，志事將無成，正確地闡述了方志學與歷史學、地理學之間的關係。

朱希祖在史館修史方面多有建樹。他曾參與《清史稿》的修撰和審查。抗戰時期，他更是主張國家要重視國史編修。他說：“蓋吾族自有其歷史，決不甘屈服於他族之下。是故亡史之罪，甚於亡

國。國亡而國史不亡，則自有復國之日。何則？其魂魄永存，決不能消滅也。自古以來，滅人之國，必以其歷史為先務，端由於此。”“民族之所以悠久，國家之所以綿延，全賴國史為之魂魄。”^⑦在主持國史館期間，他撰著了《史館論議》，論述了國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歷代修史之利弊得失、中國歷代修史機構的組織和運作，總結古今中外國家組織修史的經驗教訓，制定國史館的組織條例和選取史學人才的條例。在民族危亡之際，他主張通過纂修國史，激蕩愛國保家之民族士氣，表現出一個歷史學家的神聖使命感。

朱氏一生花費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，他是公認的南明史權威，曾在《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》二卷七期上發表《編纂南明史計劃》。他致力於南明史料蒐集達三十多年，抄本秘籍，無不悉力致之，故其收藏，無人能比，曾發表南明史籍題跋七十多篇，代表作有《弘光實錄抄跋》、《校抄本思文大紀跋》、《稿本魯之春秋跋》、《抄校本存信編跋》等；他結合自己對晚明史的研究，談到了治史之三期，很能反映他對史學研究的看法。他說，作史之業，蓋有三期，第一是蒐羅期，第二是考訂期，第三是去取期。這三期的要求則是：“蒐羅務期廣博”，“考訂務期精審”，“去取務權輕重”。在第一期中，“一方竭吾之力，從事蒐採，一方隨所得書，從事整理，不必以前人所見之目盡入吾藏，方從事於著述也”。在第二期中，由於“前人著書，往往貪多務廣，不加考訂，即據為事實，遂至真偽不分，是非難別”，所以必須考訂事實。而考訂一事，往往由甲及乙，由乙及丙，輾轉牽連，都有異說。所以，“欲定甲事，必先考乙，欲定乙事，又必考丙，非至靜不能理其糾紛，非至明不能斷其是非，非借助金石檔案、詩文筆札，亦無以知其致誤之由。故有豐富之史籍，非經縝密之考證，譬猶金鐵未煉，泥沙未汰，不足以成器皿也”。在第三期中，之所以去取務權輕重，是因為“一切史材，非皆有用，何者宜取，何者

宜去，非立定標準，不能權衡輕重。前人著史，往往側重朝廷而輕視社會，注意政治而忽視文化，崇奉英豪而忽置羣衆，發揚道德而罕言經濟，至若夷夏之辨，治亂之理，亦多忽諸”。所以，“史料之考訂，雖極精確，而編纂之時，亦須緯以社會最要之條款，經以科學嚴格之律令，方足稱爲上乘”。關於這三期的關係，朱氏舉了一個例子，說：“譬如覽宮室之美，第一期欲其入門也，第二期欲其升堂也，第三期欲其入室也。既不可躡等以求，亦不可一蹴而幾”。從他的三期之論，特別是對第三期任務的論述，可以看出，他對史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並指出舊史學輕視社會、忽視文化、忽置羣衆、罕言經濟等弊端，認爲第三期要在前兩期的基礎上，“緯以社會最要之條款，經以科學嚴格之律令”，寫出系統的著作來，這樣的著作，纔能稱爲“上乘”之作。也就是說，作爲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，他並不認爲考證清楚歷史事實就是史學的目的，史學還有更高的一個層次。雖然如此，他仍反對沒有第一期就進入第二期，沒有第一、第二期的準備和基礎就進入第三期，批評“方今治史學者，滯初步則徒誇張目錄，截中步則徒窮探枝葉，躡終步則或輕言編纂，稗販鈔胥，或空談方法，道聽途說，銜鬻誑耀，尊己凌人，此真所謂唐華朝菌，不經風霜者也。欲其革除叫囂之風，振導樸實之學，豈不難哉”。^⑧朱氏治史學之嚴謹紮實，由此可見。

朱希祖認爲，“治史以蒐集材料、考訂事實爲基礎，以探索歷史哲學、指揮人事爲歸宿，此史學之全體大用也”。^⑨他強調史學的科學性，他曾說：“政治有黨派，學術無黨派。講史學的，尤應超出於政黨以上，乃能爲客觀的公平觀察，不爲主觀的偏私論著，方合於科學的史學精神。”^⑩他稱贊元丞相脫脫奉詔修宋遼金三史，各爲正統，是至公無私。^⑪他重視直接史料和原始資料。在北京大學期間，組織學生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。他還自費購買了差點被人當廢紙賣掉的清朝昇平署檔案，撰寫了《整理昇平署檔案記》，說